

晉唐兩宋句記輯校

李德輝 輯校

遼海出版社

晉唐兩宋行記輯校

李德輝 輯校

遼海出版社

© 李德輝 2009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晉唐兩宋行記輯校 / 李德輝輯校. — 瀋陽: 遼海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451-0749-4

I. 晉… II. 李… III. ①遊記—作品集—中國—晉代②遊記—作品集—中國—唐代③遊記—作品集—中國—宋代 IV. K26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09) 第184299號

晉唐兩宋行記輯校

責任編輯 徐桂秋

責任校對 李晨

封面設計 新宇

出版者 遼海出版社

地址 沈陽市和平區十一緯路二十五號

郵編 110003

電話 024-23284460

印刷者 沈陽市印刷研究所 (有限責任公司)

發行者 遼海出版社

開本 16開

字數 670千字

印張 35

出版時間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第一版

印刷時間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 貳佰肆拾元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項目（教古字

〔二〇〇五〕〇五二三號）

前言

行記是對古人撰寫的各種旅行記錄的總稱，是一種獨立性很強的著述樣式，同時也是一種很獨特的文類。它孕育於漢代，滋長於魏晉南北朝，盛行於隋唐兩宋。明清時期，記載長途旅行的行記更加發達，奇花異卉，磅礴於文學之林，其流風餘韻遠及近現代，可謂源遠流長。究其實質，則是一種專述旅行的文學樣式，其內容、體式、寫法，往往隨着國內交通的開拓、交聘制度的完善、海外關係的拓展、作者身份的變異、行旅目的的不同而發生相應的變化。從古到今，行記這個大家族衍生出許許多多的品種與類別：以作者的身份而論，有僧人行記、聘使行記、文臣行記、無宗教色彩或官方任務的個人旅行記、域外人士來華行記；以體式而論，常見的有記傳體、行錄體、筆記體、綜述體。內容上多述行程經見、山川道里、風俗民情，傳奇述異，境界奇絕，異彩紛呈，內涵豐厚；寫法上常以第一或第三人稱口氣敘事寫人，中多寫景抒情，想象聯想，兼具人物傳記和遊記的文體要素與著述特徵。既有整部的著述，也有單篇的文章，自漢至清，多達五六百種，文獻存量巨大，多未經全面系統的整理，文學價值和文化價值都極高，值得投入精力研究。從古典目錄學的角度考查，著撰行記確為晉唐兩宋明清的時代風尚，各朝人士紛紛述作，數量甚豐，但流傳至今，亡佚大半，致使人們對它的源流演變、文體特徵以及與其他文體的關係都不是很清楚，這也增加了我們研究的難度。

漢唐兩宋行記研究的歷史與現狀都不是很理想，原因就在於多數行記都偏於寫實而不重形象，歷史文化內容多於文學描寫，因此遭到文學研究者的排斥，卻得到史學研究者和文獻考據家的格外垂青。而搞歷史的和搞文獻的又不是從整體上去對待它，而只是選取其中價值獨特的西域、南海行記作為研究重點，至於其他行記則很少顧及。自唐宋以來格局就是如此。西域、南海行記述異域風土，年代久遠，內容鮮見，資料翔實，史料價值高，故歷史地理學家和文史考據學者常常據以箋證正史四夷傳或外國傳。清代嘉慶、道光以來，世風丕變，治學重點亦由一般的經史轉移到西北史地，此

類著述遂又派上了新的用場。边疆史地專家、浙江仁和丁謙曾據晉唐行記箋證過晉隋八史，並且獲得了成功，^①以後各家順着此路往下走，主要圍繞《法顯傳》、《大唐西域記》、《入竺記》、《經行記》、《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等名著展開專書研究，大都目標專一，精耕細作。著名學者如王國維、伯希和、沙畹、長澤和俊、馮承鈞、岑仲勉、張政烺、季羨林、范祥雍、章巽等都有著述，百餘年來，參預此事的中外學者多達數十人，著述極豐，重點則都在歷史地理、文獻考釋上，而不是文學研究。重要的論文如牛致功《試論〈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史料價值》^②，季羨林《絲綢之路與西行行記考》也屬歷史地理研究^③，或是在綜合性的文史研究中涉及它，而不是針對它的專題研究，如劉躍進《六朝僧侶：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等^④。總之，專書的研究、具體的考據已進行得相當深入，其作為一類著述、一種文類的各方面情況卻相當模糊，無論是歷代著述的概況還是行記內部的文體演變，都不大清楚，甚至成果闕如，誰想要做這方面的研究，就得靠自己摸索。可見今日有心之人想要從事古代行記的文學研究，確實遭遇到極大的困難。

話說回來，這種局面很大程度上是行記自身造成的。作為一種特殊的文類，傳統的行記內容博雜，涉及交通、佛教、地理、民俗等方面，性質上亦文亦史亦學，因此各門學科對待它也只能是各取所需。文學研究者則只從文學性着眼，選取那些文辭優美、敘述雅潔、情感動人、意蘊豐富的篇章來鑒賞研究，而對絕大多數文學性不夠的文本則視若無物。其研究都不是從文體上着眼，而是從文筆上着眼。很顯然，從文學的立場上看，人們對行記還談不上系統的研究。其實，古行記記述旅途見聞，描寫景物古迹，記載風土人情，表達作者感情，體現的正是中國散文追求實用、崇尚真實、提倡簡潔的民族特徵，是民族文學特性的集中體現。宋代以後，多數行記更被寫得文采斐然，面貌大異於古，宋人張舜民、樓鑰、范成大、呂祖謙、周必大的行記，以及衆多的明清行記，文學性都極強，因此多被收入作者的文集，或竟單獨流傳。

① 分別見張舜徽主編《二十五史三編》，第四分冊，丁謙《後漢書各外國傳地理考證》，岳麓書社，一九九四年，頁五七三—六〇六；丁謙《三國志外國傳地理考證》，頁一一一—一三三。同上書，第五分冊，頁二四六—二五〇，丁謙《晉書四夷傳地理考證》，頁四九二—四九八，丁謙《宋書夷貊傳地理考證》，頁五二〇—五二三，丁謙《南齊書夷貊傳地理考證》，頁五三二—五四一，丁謙《梁書夷貊傳地理考證》，頁九五五—九八五，丁謙《魏書各外國傳地理考證》，頁九八六—九九一，丁謙《周書異域傳地理考證》，頁九九二—一〇〇六，丁謙《隋書四夷傳地理考證》。

② 《人文雜誌》一九九三年第二期。

③ 《中國海洋大學學報》二〇〇四年第六期。

④ 《中國社會科學》二〇〇四年第五期。

雖然迄今為止尚無一種專著對中國古代各體行記做全面深入的文學研究，但從其他角度出發研究行記的成果卻有不少，^①近年來，從史地或文化角度論述宋元明清行記的成果已相當豐富，文學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也有一些，如王立羣《中國古代山水遊記研究》^②，研究古代遊記，但跳出了傳統的遊記文體研究範圍，而將學術視野擴大到晉宋地記、輿地遊記及部分行記，指出這些著述的發展演變對於遊記文學的貢獻，其學術視閥、研究方法和所得結論都很啓人心智。陳左高《中國日記史略》則從日記體的文體形式出發，首次詳細論證了自唐至清末衆多日記的起源、名稱、興衰、主要作品及其價值，其中論及古代行記達數十種之多。^③韓兆琦《中國傳記文學史》^④、李祥年《傳記文學概論》^⑤論述古代傳記的藝術範疇、基本形式、美學原則、社會價值、與其他文學樣式的關係，其中亦有涉及記傳體行記者。香港學者郭少棠的新著《旅行：跨文化想象》將古人的出行分爲三類，^⑥以「旅遊」指稱今人的觀光娛樂旅行，「行遊」指具有實際目的、時間跨度較長的非觀光娛樂旅行，建立「行遊」的概念，採用跨文化的角度研究行記，強調文化的差異性，這樣一來，大部分古代行記就可順理成章地納入我們的研究視野。類似的研究雖不都直接指向行記文學，但可增進我們對行記內涵及藝術表達的理解，因而也十分有益，不失爲行記研究的一個進路。目前，迫切需要把這類成果用於對行記文類的整體性研究。本書的編撰、本文的撰寫，即是出於這樣一種學術考慮而進行的一種學術嘗試。

① 目前，行記的專書研究與文獻整理大有日趨專深的趨勢，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外交通史地叢刊》，將漢唐以來的重要行記統統視爲交通史籍，組織專家予以校註箋釋，以八十年代初季羨林先生《大唐西域記校註》的問世爲標志，至近年楊武泉先生的《嶺外代答校註》，所出整理專著多達十六種。以上說的還只是存世的較爲完整的本子，另有許多已佚行記，近年來也出了幾種重要輯本，如趙永春《奉使遼金行程錄》（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賈敬顏《五代宋金元人邊疆行紀十三種疏證稿》（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這些書雖然不是正面的文學研究，却是重要的文獻學和歷史學基礎，離開了這些成果，筆者的研究同樣寸步難行，特此註明，以申謝忱。

② 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③ 上海，上海翻譯公司，一九九〇年。
④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⑤ 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⑥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行記以旅行為記述對象，但各人旅行的背景目的、出使路線、經行地域、文化素養、脾氣性格往往各異，行記的寫法、內容、風格也就不可能相同，而只能是千差萬別，因人而異。以內容而論，有記域外經見的，有記南北通聘的，有記行幸征伐的；以作者而論，有遠使域外的使臣，有忘身求法的僧人，有隨駕的文臣，有從軍的幕僚；以風格而論，有文字古拙，文風簡樸的，有詞藻華麗，逞才炫學的，有搜奇獵異，誇張想象的。各類行記起源的時代也各有早晚，各具淵源，因此只能分別論述。

根據時代的前後，最先出現的是兩漢使臣撰写的出使行記。從現存史料考察，此類行記起源的背景是兩漢時期與周邊民族政權互相遣使的活動，與漢代的周邊外交有直接的關係。西漢帝國建立之初，就很重視發展與周邊政權的關係。漢高祖十一年（前一九六），高祖派遣文臣陸賈出使南越，冊封趙佗為南越王，南越臣服於漢，陸賈不辱使命而歸。陸賈此次出使南越，撰有使程記，題《南越行紀》。魏晉時此書仍較完整，西晉嵇含所撰《南方草木狀》曾多次徵引此書，今本《南方草木狀》尚存文兩條，均標出陸賈《南越行紀》。楊慎《升庵集》卷三四《素馨花》詩註也引有一條，作陸賈《南中行紀》，所謂《南中行紀》不過是《南越行紀》的異稱。

陸賈此書，《隋書·經籍志》（下或稱《隋志》）、兩《唐書》《經籍志》、《藝文志》（下或稱兩《唐志》）不載，宋代書志則偶見著錄。《雲南通志》卷三〇《雜紀》門載雲南異迹遺文，其中「《南中行記》」條註曰：「漢陸賈傳，載《崇文總目》。」^①然《南中行記》這一書名，卻不見於今傳各本《崇文總目》，可見其書不顯於唐宋。此書係西漢著述。衆所周知，秦漢著述在劉向、劉歆父子校定以前，多無定名。陸賈此書既出自漢初，《漢書·藝文志》（下或稱《漢志》）又未著錄，則《南越行紀》、《南中行紀》的書名，當是後人所擬。然既稱行紀，其中必有紀行的內容，只是從現存的佚文看，原書中這些內容似乎都已被後人刪除，剩下的全是對嶺南風土異物的記錄，充滿搜奇獵異意味，體近異物記，已經難以看出它的行記性質來。只有注意到它紀行的目的和行旅的背景，纔會明白，它與純粹的異物志原來還

①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五七〇冊，頁七四五，下。

是有差別的。

陸賈此書所敘範圍還在中土，張騫《出關志》則寫外國，《隋書》將其混雜在《經籍志二》史部地理類衆書之中，不易看出它的性質。至鄭樵《通志·藝文略》始加區分，明其倫類，將其放在「地理·行役」類之首，從而顯示出該書屬行記這一著述類型。唐道宣《釋迦方志·遊履篇第五》搜括傳記，概述漢唐西遊事迹，首舉張騫，則又從內容上表明它的紀行性質。但該書多載外國方物，兼具地理博物性質。《史記·大宛列傳》開頭即曰：「大宛之迹，見自張騫。」^①細繹文義，這裏的「張騫」似乎不僅是指張氏本人，還兼指他所撰的行記，說明它是司馬遷修《大宛列傳》的重要史源。傳文中所載「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等內容，^②疑皆出此書。據道宣《釋迦方志》卷下記載，後漢永平三年（六〇），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西遊天竺，尋訪佛法，後尋舊路返回洛陽，當時也撰有傳記。建安十年（二〇五），又有成光子者，奉秦州刺史之命西行，窮於達觀，旋歸之日也「自出別傳」^③，該書記述西行，也屬行記。

以上產生於兩漢的四書，代表了使臣行記的最初形態：因屬跨文化旅行，異域風土人情對中華士人很重要，故在內容上略述行程，詳載方物，重在域外。但體例卻駁雜不純，寫法也單一少變，從而有別於那些後起的專述行程的旅行記。然而它們的出現，卻標志着行記之胚胎孕育階段的完成。其在行記發展史上的主要意義，一是以專書紀行的做法，直接引導了同類著述的繼起，極具開創性；二是「行記」的命名也是一個創舉，此舉既為行記由一種著述演為一類文體創造了必要條件，也豐富了魏晉南北朝史部地理類著作的門類品種，這兩點都是很有意義的。我們注意到，最早稱引陸賈《南越行紀》的是西晉人嵇含，無獨有偶，最早徵引張騫《出關志》的朝代也是西晉，而最早的僧人行記也出現在晉代，不能說這三者毫無關係，至少說明晉代是此類行記定型成體和開始流行的最早時代，是它在形式和寫法上趨於成熟、趨於穩定的時代。而且出使回國，自為撰述紀錄出使經見，也是為後來的行記發展史所證明了的古行記產生的重要機制之一，陸賈、張騫的行記就是這麼產生的。《資治通鑑》卷一九《漢武帝元狩元年（前一二二）五月乙巳》條

① 《史記》卷一二三，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頁三一六七。

② 同上書，頁三一五九—三一六〇。

③ 《釋迦方志》卷下，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〇年，頁九六一—九七。

載：「初，張騫自月氏還，具爲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有城郭、室屋，如中國。」^①此類見聞，張騫原書中必多有，因而得以修入《通鑑》。這一做法對後人也是有啓示的。南北朝時，人們受此啓發，撰寫了很多紀行的專書，都題作「行記」，《隋書·經籍志二》史部地理類著錄頗多，計有佚名《江表行記》、姚最《序行記》、《魏聘使行記》、《李諧行記》、李繪《封君義行記》、薛泰《輿駕東行記》等六種；少數作「行傳」、「遊記」，如《慧生行傳》、劉師知《聘遊記》。此外還有作「記」、「傳」的，如戴祚《西征記》、智猛《遊行外國傳》，究其實質也是行記，這些著述與陸賈《南越行紀》、張騫《出關志》的前後聯繫，昭然可見。

秦漢晉隋唐海外貿易的開通對行記的影響也不可忽視。研究表明，漢代人已掌握了近海航行技術，並致力於海外貿易的拓展。西漢東南沿海的遠海航船，常從徐聞、合浦以通南海，甚至遠達印度東南沿海和斯里蘭卡。^②東漢王朝也與緬甸、印度、大秦通商。三國時，東吳孫權曾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揚帆出海，遊歷南海，所經及傳聞有百數十國。歸國後，兩人根據見聞，分別撰有《扶南異物傳》和《吳時外國傳》。二書雖非行記，但其中關於海外諸國社會文化、交通地理、風土人情方面的記載，對於晉隋士人域外行記的撰寫也是有啓示的。海外貿易的開通增強了人們對海外的關注度，開闊了人們的文化視野，這也是此類行記產生的重要前提。

上述因素促進了南北朝隋唐外國行記的創作，使之蔚爲大觀。寫法上也有所改變，開始嘗試用傳記體寫作行記，將對地理方物的記載與對行程的記述相結合，強調內容的完整性和經歷的連續性，而不再像以前那樣隨事記載，寫成的一條一條的筆記體。從文體學上看，相對於筆記體，這種「行傳體」無疑是一個進步。隋朝常駿等人出使赤土國寫成的《赤土國記》二卷，就是這樣一部兼具行傳性質和地記色彩的書。其書雖佚，但《隋書·南蠻傳》、《北史·赤土國傳》都有引錄。從今存佚文看，乃是地理博物與行旅記述的結合，單純將其視爲地理博物之書或是以行程爲主的記述，都有失片面。這類行記的成批出現，既表明外國風土異物記的繁榮對於行記撰寫的促進作用，也標志着外國使臣行記初創階段的完成和創作的趨於繁盛。

晉宋齊梁間，佛教在中土迅速傳播，中國僧人對於佛教的宗教熱情空前高漲，許多僧侶不畏艱險，遠赴中亞、天竺

① 《資治通鑑》卷一九，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五六年，頁六二七。

② 一九三七年出版的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首章即題爲《漢代與南海之交通》（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八年，頁一一〇），專論此事，爲這方面較早的成果，其餘甚多，茲不一一。

巡禮求法，後世多稱西行求法運動。部分求法者歸國以後，撰有旅行傳記。其中問世較早、較有代表性且至今存世的是東晉僧人法顯的《佛國記》，一名《法顯行傳》，一卷^①，《隋書·經籍志二》著錄。此書創造性地運用旅行傳記的體式寫作，以精煉質樸的筆墨記載行程，用第一人稱口氣講述僧人西行求法的經見，特別重視對行程的記述，還有部分描寫景物和抒發感情的文筆，雖然文筆拙樸卻很實在，很真摯感人，文學意味更強而地理博物色彩較淡，這是它不同於使臣行記的幾個地方，也是它在行記發展史上的主要意義所在。

自從有了法顯的行記以後，它的這種著述形式和寫作方法便一直影響着後代，成為僧人行記的典範，效仿者代代有之。晉末宋初，沙門智猛西遊，撰有《遊行外國傳》，沙門僧寶著有《游方沙門傳》，沙門慧景、道藥、道普等，也撰有西行傳記^②。僧人行記就脫胎於這批早期的西行傳記中，以法顯、智猛、僧寶等為代表的魏晉齊梁僧人，則是行傳的創始人和發揚光大者。梁慧皎《高僧傳·序錄》的記載也可證實這一點，中云：「自漢之梁，紀曆彌遠。……衆家記錄，敘載各異。沙門法濟，偏敘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③所謂「遊方一科」也即遊方僧人撰寫的旅行傳記。《高僧傳》卷三《宋京兆釋智猛傳》也說：「余歷尋遊方沙門，記列道路，時或不同，佛鉢頂骨，處亦乖爽。」^④類似這種「記列道路」的僧傳，其實就是《高僧傳》所說的「遊方一科」，二者名異實同，都有行記性質，數量相當可觀，梁代僧人僧祐、慧皎等提到很多，唐僧道宣《釋迦方志》卷下列出八種，《隋書·經籍志二》地理類有《遊行外國傳》、《慧生行傳》、《歷國傳》、《大隋翻經婆羅門法師外國傳》等五種，《隋志》不載而散見於他書者有宋雲《宋雲行記》、寶雲《外國傳記》、曇無竭《歷國傳記》、道普《遊履異域傳》、支僧載《外國事》、曇勇《外國傳》、支曇諦《烏山銘》等七種。據唐人杜佑稱，它們都是晉隋僧人的「遊歷傳記」，多載中華人士

① 《法顯傳》在歷代著錄中，有很多不同的名稱，如《佛遊天竺記》、《歷遊天竺記傳》、《佛國記》、《法顯傳》、《法顯行傳》等，它們並非都是同書異名，而是有的出自法顯自撰，有的則屬後人傳述，作者不同，卷數也各異，主要有一卷本、二卷本兩種。以上情況，章巽《法顯傳校註·序》（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八年，頁五十一）有詳細考證。

② 晉唐僧人西行傳記的研究，上世紀三〇年代就開始了，代表性成果為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該書第十二章《傳譯求法與南北朝之佛教》前四節，深入論述了晉南北朝佛教交通地理（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頁二六六—二七六），其中對於此間西行傳記及其作者多有深入考述，筆者這裏的研究，即以此書及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中國印度之交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頁一一三—一四八）等近人著述為基礎。

③ 《高僧傳》卷一四，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頁五二三。

④ 同上書，卷三，頁一二六。

遊行西域、天竺、南海的珍聞異事，杜佑撰寫《通典·邊防典》時曾參考過。上述事实說明，六朝隋唐間凡有海外行程，皆「別出傳記」以備載見聞，乃是一種通例，一種頗為流行的時代風氣。

上述行記多出僧人之手，因為重視記敘人物活動，內容上偏重於述行，所敘具有較強的故事性，因而目錄學上的著錄，或他書的徵引，或稱「行傳」。究其性質，則仍是一種史部傳記，屬僧傳的一個變種。說它是變種，主要是因為它雖脫胎於僧傳，但寫法和性質與其他任何僧傳都不一樣：它只寫僧人一段時間內在域外的巡禮求法經歷，不涉僧侶之外的其他人物和巡禮求法之外的其他事件，既寫人又敘事，中心明確，內容集中，所有這些，都迥異於那些司空見慣、平鋪直敘的高逸傳、寺僧傳、大德傳和綜合性僧傳，也有別於其他任何子史著述。其所記載的重點，一是行程本身，包括出行的路線、方向、里至，都用簡明的語言記述下來，一般是以一段行程為敘述單位，將所經各地的地理位置、山脈河流、地形氣候、交通城市、風土習俗、物產資源、民族歷史、佛教傳說等一一「編織」成敘述性文字，中多中亞、南亞、西亞歷史地理社會史料；二是有關佛教的大事，包括佛教盛衰、經典譯註、宗派建立、寺宇建築、佛教交流等方面，都有聞必錄，雖然虛虛實實，難以盡信，然皆中華人士所稀見，故仍很受重視。^①

總結以上，僧人行記的興起過程和演化軌迹似可概括為普通僧傳——游方僧傳——旅行傳記三階段，其中起關鍵作用的是《法顯行傳》等典範作品的問世與流行，這為行傳演變為一類著述創造了條件。晉唐兩宋金元間眾多的行記，或多或少都與僧人行記有着血緣關係，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就在僧人行記興起的同時或稍後，又出現了一種新的行記——文臣行役記。它所涉範圍既不在外國，也不在周邊，而在中土，記述的是南北朝文人從駕、出征等行役之事，唐宋古籍載錄頗多，清人章宗源、姚振宗等曾對其作過考證。結合諸家研究所得，計有郭緣生《述征記》、戴延之《西征記》、裴松之《北征記》、伍緝之《從征記》、丘淵之《征齊道里記》、沈懷文《隨王入沔記》、薛泰《與駕東行記》、姚最《序行記》、諸葛穎《北伐記》等二十多種。^②郭緣生、戴延之、裴松之、伍緝之、丘淵之等人，都是劉裕軍府的幕僚，所撰行記記述的都是晉末隨劉裕北伐慕容燕、西征姚秦的沿途經見。姚最的行記載其隨周武帝攻齊之事。薛泰、諸葛穎的行記載二人隨梁武帝、隋煬帝行幸征伐之事。從今存

① 參見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註·玄奘與〈大唐西域記〉》，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頁八九—一〇二，一一〇—一一三。

② 參見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五五年，頁四九〇—五〇三。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同上書，頁五〇三—五〇四。

佚文看，不少作品記述詳細，文風誇飾，多載傳聞，卷數在三卷以上，篇幅相應增加，有別於外國行記、僧人行記的質樸與簡單。

東晉以來，我國南北各地先後出現了許多政權，都經歷了由對立走向通和的過程，遣使交聘則是實現和解、維繫穩定的主要手段，因此有了記載這些政治活動的交聘行記。作者都是南北朝的聘使，交聘路線都在雙方的國都之間，如梁魏間是「洛陽—建康」「鄴都—建康」，陳隋間是「長安—建康」。此類著述記載的重點，就是這些南北雙方交通沿線的自然景觀、社會面貌、文物古迹。根據內容的不同，可細分為北使聘南和南使聘北兩小類。其中北使聘南的有《魏聘使行記》、《李諧行記》、《封君義行記》、《江表行記》等，南使入北的有江德藻《聘北道里記》、劉師知《聘遊記》、姚察《西聘道里記》、佚名《朝覲記》等。

以上先唐行役記、交聘記的作者都是侍從文臣或朝廷大臣，其行役記和交聘記運用的體式，多為筆記體。這是一種別出於行傳體之外的紀行體式。其一般寫法是以行程為綫索，選擇遊履區域中的若干景點作記述對象，一事一條，逐條記載，內在地包含着「紀行文字＋景點記述＋民間傳說」的敘述結構。作為一種著作體式，其主要特點是「行記的體例＋地志的內容」，屬於一種「詞章家之地學著述」，即以詞章家的文筆敘地理風土，以行程為綫索串聯材料，以地志的編排方式分立條目。這種體式在南北朝文人的同類著述中普遍存在，說明是當時頗為通行的一種體式，為此間文人撰述交聘、行役記時所普遍採用，而不是一家兩家偶爾為之。

二

唐以後，行記自然地演為四大流別：出自外國使臣之手的行記多記域外地理方物、風土人情，文筆華麗，文風誇誕，志異炫博的意味很濃；出自僧人之手的行記仍然謹守晉宋僧人行傳的舊規，採用傳記寫法記人敘事，條理分明，首尾完整，內容連貫，文風拙樸，充滿宗教神秘色彩；出自文臣之手的行記文學性最強，內容也最豐富；或重行歷的記載，或重見聞的記述，或重感情的抒發，甚至附載沿途唱和，展示文采風流，不拘一格，各具情態。三種體式以外，還有一種綜述體，都不是作者的自作，而是對前人或時人行記的改編，這是此類行記與其他行記最大的相異之點。唐人道宣的《釋迦方志·遺跡篇》和賈耽的《皇華四達記》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兩書都是據唐代及唐前的僧人行記和使臣

行記改編而成的新文獻，雖非原文，但內容與原來的行記相去不遠，故仍屬行記的一種變體。以上四種體式長期並存，流傳展衍，至於清末民初仍餘脈未斷，成爲中國古代行記最基本的體式。

較之先唐，唐人行記的種類增多，若以作者和地域爲準分類，則僅外國行記就有四個小類：一爲僧人求法行記，如《大唐西域記》、《歷遊天竺記》、《入竺記》。二爲外國使臣行記，載唐五代官員出使西域、南海諸國的經過，代表作有王玄策《中天竺國行記》、達奚通《海南諸蕃行記》、章僚《海外使程廣記》等。三爲外國僧人來華巡禮求法行記，有《往五天竺國傳》、《唐大和上東征傳》、《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行歷抄》等。四爲唐官奉使邊疆諸蕃國行記，有韋機《西征記》、顧愔《新羅國記》、韋齊休《云南行記》等，杜環《經行記》也可劃入此類。不涉外國，專載唐人國內遊幕、遷貶、奉使、求法等旅行活動的，有韓琬《南征記》、李翱《來南錄》、韋莊《蜀程記》、王仁裕《入洛記》，以及敦煌文獻中發現的四種《往五臺山行記》。以上諸書大都未經系統的輯錄，可予輯復。

宋代行記的數量與種類較之唐五代又大增。除了僧人行記的數量銳減於前外，^①其他三類都大增，有佚文可輯的數量也更大。據查，宋人撰寫的各種外國行記多達五十六種，國內行役記達二十四種，無論內容、形式、風格、情采都極爲豐富，標志着行記在宋代步入了空前未有的繁榮階段。

最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宋人使蕃行記的勃興。這類著作的興盛，有着深遠的社會歷史背景，這個背景，就是安史之亂以後胡漢國勢的此消彼長。唐自安史亂後，國勢日衰，西戎、北蕃則國勢日盛，成爲中國新的強鄰。至於宋初，外患更加嚴重。宋朝既未能有效抗擊外敵的入侵，在對外戰爭中頻頻失利，就只能接受敵國提出的苛刻條件，遣使通和。天長日久，這一政策竟然取代了抗敵禦侮，成爲宋王朝內政外交上的大事，交聘被制度化，宋朝與遼夏金元各設國信使，互相通問，使事繁多，名目不一：每逢新主即位、上尊號、生辰、正旦等重要時機，朝廷都要遣使祝賀，若逢國恤之日，則要遣使告哀悼慰祭奠，此外還有告慶、諭成、報聘、報謝、祈請等名目，依照當時禮制也必須派遣使節。遣使交聘事關國體，朝野上下都很重視。爲了維護國家利益，顯示大國尊嚴，朝廷常精心挑選能臣充使。這些奉使外國的「行人」，大都能言善辯，工詩善賦，應變能力既強，才望人品亦佳。時間一長，參預交聘的文人大增。他們多懷有強烈的

① 現存的宋代僧人西行記，僅有紀業《西域行程》、施護《天竺行述》兩種，分別保存在范成大《吳船錄》卷上和《宋會要輯稿》卷二九八七八、《文獻通考》卷三三八等處。

愛國熱情和民族自尊心，出使期間都曾蒙受恥辱，痛憤交加，南歸以後，很多人既是出於外交使臣必須呈交出使記錄這樣一種制度規定，也是爲久積心胸的憤恨所驅使，紛紛仿效前人，撰作行記敘事抒懷，大量的宋人入蕃行記，就在這樣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孕育出來，並維持了持續兩百餘年的繁榮。所記範圍都在宋蕃之間，可以考見者有四十多種，其中部分有佚文留存，部分則只有書名、解題或其他旁證材料散見於各種古籍之中，通過此類史料，人們得以窺其崖略。

出使契丹的行記是北宋使蕃行記的主體。這方面的作品有王曙《戴斗奉使錄》、路振《乘軺錄》、宋搏《上虜中事》、王曾《上契丹事》、晁迥《虜中風俗》、薛映《虜中境界》、宋綬《虜中風俗》、寇瑛《奉使錄》、余靖《奉使錄》、富弼《奉使錄》、范鎮《使北錄》、劉敞《奉使錄》、宋敏求《入蕃錄》、沈括《熙寧使虜圖抄》、張舜民《使遼錄》等。^①

進入南宋以後，宋金交聘取代了宋遼交聘，這方面的行記更多更好。徽宗末至高宗朝，此類行記的創作達到了高潮，計有連鵬舉《宣和使金錄》、陶悅《使北錄》、趙良嗣《燕雲奉使錄》、馬擴《茆齋自敘》、鍾邦直《舊帳行程錄》、許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李若水《山西軍前奉使錄》、鄭望之《靖康城下奉使錄》、沈瑄《南歸錄》、楊應誠《建炎假道高麗錄》等。

宋金和議以後，使金行記的創作仍高潮不斷。舉其要者，有汪藻《金國行程》、洪皓《使金行程記》、樓鑰《北行日錄》、范成大《攬轡錄》、姚憲《乾道奉使錄》、韓元吉《朔行日記》、周輝《北轅錄》、鄭儼《奉使執禮錄》、鄭汝諧《聘燕錄》、余燦《使燕錄》、程卓《使金錄》、王大觀《行程錄》，宋末又有鄒伸之《使韃日錄》等使蒙古行記。

遼、金、元以外，與宋室保持外交關係的還有高麗、大食、交州、回鶻、吐蕃、党項、高昌、于闐、大理及河西蕃部等，宋人也留下了這方面的行記，如陳靖《使高麗記》、徐兢《使高麗錄》、佚名《高麗行程錄》、王延德《西州使程記》、辛怡顯《至道雲南錄》、劉渙《劉氏西行錄》、檀林《大理國行程》、佚名《蒲甘國行程略》等。

不涉出使外國，專載宋人國內行役的行記，同樣很豐富。或記帝王的出奔行幸，如范質《晉朝陷蕃記》、蔡偉《北狩行錄》、李正民《己酉航海記》；或記宋人的山川遊歷，如李用和《遊蜀記》、陳文蔚《遊吳江行記》、呂祖謙《入

^① 宋人出使遼金蒙元行記中，多帶有虜、蕃等字眼，含有強烈的民族情感，但在後世多被易以其他中性詞，如易虜爲邊、北等，五代胡峴《陷虜記》就有《陷北記》、《陷邊記》等別稱，沈括《熙寧使虜圖抄》、晁迥《虜中風俗》分別改稱《熙寧使契丹圖抄》、《契丹風俗》，諸如此類，皆非原名，而不能以一二數，姑舉數例以爲說明。

越錄》；或記宋代官員的出貶，如歐陽修《于役志》、張舜民《郴行錄》；或記宋代官員的罷任回朝、歸鄉省親，如周必大《奏事錄》、《歸廬陵日記》；或記宋人的軍幕使途，如鄭剛中《西征道里記》；或記北人南投宋國的經歷，如張棟《南歸行程記》；或記宋人充當館伴使接待遼金使節的經過，如倪思《重明節館伴語錄》；或記宋人的會友遊學，如呂祖謙《入閩錄》；或記中國士人的陷蕃、逢虜，如陶宣幹《河東逢虜記》，應有盡有。惟獨因為佛教的衰微，宋代的僧人西行求法巡禮行記，數量質量均遠遜前代。^①

三

先唐時古人尚質，行記有着很強的實用功能。但後來隨着文學的發展，行記的文學意味越來越濃，知識性、趣味性也越來越強，運用的表現手法愈來愈多。人們看到，從晉代到南宋，古行記的職能從專主敘事到文備衆體，從單調簡略到繁富多變，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其體貌也發生了相應變化。究其因，一方面是因為人們不斷賦予行記以新的功能與要求，於是借鑑了詩歌與抒情散文的某些創作手法，另一方面也與各種子史著述對它的滲透與影響密切有關。

首先是漢魏六朝各種記傳的橫向滲透。漢魏六朝間很多著述，名稱中都帶有「記」字，如方物記、神異記、志怪記、冥祥記、風俗記、地記、圖記、都城記、精舍記、水源記……，而此間行記也多作記傳或傳記，如法顯的行記又作《歷遊天竺記傳》，曇無竭的行記作《歷國傳記》，釋智猛的行記作《遊行外國傳》。類似這種名稱互易的現象說明行記

① 以上所敘宋人行記，屬於不同類別，內容各異，風格各別，然而迄今為止，尚無一種古典目錄學著作予以完整著錄，學界對於漢唐宋人行記的認識仍然欠全面，各人根據自己的理解，給它們安上不同的名稱，有的稱外國傳記，有的稱遊記，有的視爲傳記，有的視爲日記，如陳左高《中國日記史略》（上海翻譯出版公司一九九〇年版），其中收有不少行記。有的則又稱作日記體遊記，如王雨容《宋代日記體遊記文體研究》（廣西師範大學二〇〇七年碩士學位論文）。而賈敬顏先生則又將唐宋文人出使周邊外國的使程記稱爲邊疆行記。還有視爲地學遊記的。這些名稱確實抓住了行記內容特色的一個側面，但未能抓住其屬行記的根本性質，故而總有不盡妥當之處。千百年來人們在行記分類上的雜亂、命名上的隨意深刻地表明，人們對於行記這一特殊體式的來歷、性質和寫法一直缺乏正確和深入的認識。正因為如此，漢唐兩宋行記的科學研究，首先就得從科學的分類和命名開始，然後才談得上進一步的工作。而要做好這件事，一是要樹立全局觀念，顧及當時的全體，不能只看一體；二是要深入文體內部，分析各體的寫法。行記只是對紀行作品的總稱，它決不是無差別的整體，而是有著不同淵源流別和寫法的，作者身份和行旅的性質、目的、任務不同，作品的寫法和記載的重點就不一樣。在衆多的可供選擇的分類標準中，只有作品內容纔是區分不同性質行記的決定性因素。以此爲準，庶幾可以避免混亂。另外，按照作者身份的不同，將其區分爲使臣行記、僧人行記、其他行記，亦可避免內容上的交叉重疊，顯示其各自特點。本文采用的是後一種分法。

融「記」、「傳」於一體的文體特徵。所記對象為「行」，所傳為此人的一段行歷。既記遊歷，也傳行實，二者結合，故曰「記傳」。

其次是編年體史書和紀傳體史書的借鑑作用。漢魏以來，以《史記》、《漢書》為代表的紀傳體逐漸建立了其在史部中獨尊的地位，衆家撰述，競用此體，「一代之史，至數十家」^①。與此同時，《左傳》、《漢紀》作為編年體史書的光輝典範，對魏晉南北朝文人的影響之大亦不容忽視。不應忘記，《隋志》中，史部正史類通計亡書有八十部，編年類通計亡書也有七十三部。十八家晉書，半數是編年體。當時學者「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②。可見二體的成就地位與影響實相去不遠。行記既然與紀傳、編年二體同居史部，就必然會受到它們的影響。早期行記如《法顯傳》及同時代湧現出的衆多游方僧傳，在人物描寫、場面描寫、事件記述上都借鑑了紀傳體史書中傳記的形式與寫法，記述行程時則兼用了本紀的敘事方式，學習《左傳》、《漢紀》以來的編年體寫法，「繫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③。以事繫日，以日繫月，標以干支，明其次第，將一天或一段時間內發生的事件記載下來，既保持了行程的連續性，又不失故事的完整性。所不同者，正史記載的是全國上下的軍國大事，要對材料作嚴格篩選，行記則以一人或數人的活動為中心。要避免單調，寫好經歷，就不能不借重「傳」的寫法，以人物活動為中心，穿插情節，描寫環境。紀只能包舉大端，傳則可以委曲敘事，紀的寫法保持了事件的連續完整，傳的寫法則使作品翔實生動，人物情態畢具，敘事與寫人的手法結合，去其所短，合其所長，因而成體。

先唐西行記的作者是僧人，宗教熱情高昂但文學才華未必富贍。這些人之所以撰著行記，只是為了個人備忘，為西行求法巡禮提供參考，如法顯作《佛國記》，就是因為考慮到「諸師未得備聞」，「欲令賢者同其聞見」^④。這種實用動機使得先唐僧人行記普遍比較簡古。而且撰記的僧人都非名流顯達，像法顯，地位寒微，一介草民，恬淡恭順，言輒依實，其身份、性格也決定了作品風格古樸，用筆多平鋪直敘，絕少增飾，描寫、議論、抒情等手法用得較少。行役記、

- ① 《隋書》卷三三，頁九五七。
- ② 《隋書》卷三三，頁九五九。
- ③ 浦起龍《史通通釋》卷二《二體》，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頁二七〇。
- ④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五九三冊，頁六三三，下。